

■ 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的先驱：郑观应与李斯特 经济思想之比较研究

线文

(陕西师范大学 国际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 晚清重商论者郑观应和德国 19 世纪上半期经济学家李斯特适应于各自国家历史发展阶段, 提出了独立发展近代经济赶超先进的经济思想。在生产力、工业化、政府干预等方面提出了相似之主张。郑观应和李斯特致力于后发现代化, 其思想主张具有广阔的视野和丰富的“发展经济学”内涵。在中国经济社会的重要转折期, 郑观应为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之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开启了方向。

关键词: 郑观应; 李斯特; 经济思想; 发展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72X(2010)03-0086-06

收稿日期: 2010-03-12

基金项目: 陕西师范大学“211 工程”建设三期重点项目“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 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科研究基金项目“近代语境下的发展经济学: 晚清重商思想研究”(立项号: 09SYB12)

作者简介: 线文(1974—), 男, 北京人, 满族, 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讲师,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一、引论

晚清重商思想的代表人物郑观应(1842-1922)在他流传甚广的《盛世危言》一书中提出了引领时代思潮的“商战”论, 敏锐地指出西方列强正在对中国发动一场无硝烟的经济战争, 其危害远甚于武力入侵。在“兵战不如商战”的口号下, 郑观应提出振兴“商务”并以此为核心构建现代国民经济体系与列强展开经济之战的主张。郑观应的“商战”论在晚清社会得到广泛响应, “商战”一时成为救世的关键词: “论时事者必献商战之策, 是振兴商务为当今第一要义”^[1]。时至 20 世纪 40 年代, 商铺春联仍可见“商战胜全球”的联语, 郑观应思想之影响可见一斑^[2]。

与晚清商战论者所言“中国之利, 有往而无来者”, “精华销竭, 已成枯蜡”颇为相似, 德国在 19 世纪中期“就象富兰克林曾一度形容新泽西州那句话一样, ‘是一只被邻居们四面八方都凿了孔的酒桶, 桶里的酒都被他们吸光了’”^[3]³²³。这一时期, 英国凭借强大的工业实力, 推行自由贸易, 向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大陆倾销廉价的工业品, 对德国的工商业和传统产业造成严重的破坏。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落后的德国何以独立地发展民族经济而不致成为发达国的附庸并快速地赶超英国和法国? 作为 19 世纪上半期德国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的李斯特(Friedrich List, 1789-1846)应对了此一挑战。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通过分析各国的经济发展史, 在批判斯密经济自由主义的基础上, 针对德国的现实提出了一个落后国家如何发展本国经济的理论和政策体系。这一体系以发展“国民生产力”为中心, 包含了对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社会、经济、文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分析。李斯特的经济思想对后来德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时所有大学都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该书甚至成为俾斯麦的案头书^[4]。

相较于《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亦可谓经济救世“小百科”, 一经刊出即被大臣推荐给光绪帝阅读, 光绪帝亦令总理事务衙门印刷分传大臣览阅。《盛世危言》一书刊印多种版本, 流传广泛, 影响深远, 孙中山等人深受启发和影响。

郑观应和李斯特基于落后国家特殊的历史环境和发展阶段, 提出了具有抵御外部经济冲击,

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主张。因此，将他们的经济思想进行比较分析不失为一研究视角。本文以《盛世危言》和《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这两部二人的代表著作为中心，尝试通过郑观应和李斯特经济思想的比较，为晚清经济思想及郑观应的研究提供一新的视角。

二、生产力、精神资本与“心战”说

生产力理论是李斯特经济思想的核心，他提出：“要解释经济现象，除了‘价值理论’以外，还必须考虑到一个独立的‘生产力理论’”^{[3]122}。他指责古典学派从世界主义经济学出发，只重视财富和交换价值，而忽视了生产力。李斯特认为：“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重要多少倍”^{[3]118}。这意味着，“国家财富并不在于交换价值的占有，而是在于生产力的占有，正同一个渔夫的财富不在于占有多少条鱼，而是在于不断地捕鱼以满足他的需要的那种能力与手段”^{[3]296}。在李斯特看来，财富之生产力不仅可以使原有价值得到保存，而且可以使已经消耗掉的价值得到补偿和增殖。因此，如何发展生产力成为一个落后国家发展本国经济，赶超先进的核心问题。

郑观应在商战论中并未提出“生产力”的概念，但却有十分类似的表达。他在论述西学与促进生产、发展经济紧密的联系时，曾说道：

诚以天地五行之产，俱从格致中得来。……川泽之利，王政所重，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故美国由格致之理以深究养鱼之法，陂湖江海，各因其地，不必竭泽而求，自可山人借足。……然富国而不思理财，理财而不求格致，犹之琢玉无刀凿之利器，建屋无栋梁之美材也^{[5]281-282}。

中国传统的思想表述一般不作概念抽象，而是借物喻义。“琢玉”所用“刀凿之利器”、“建屋”所需“栋梁之美材”实际上是将格致之学视为一种创造财富的有效手段与能力。而郑观应将财富的创造都化约为“俱从格致中得来”，这与生产力概念所表达的内涵已十分接近。另外，郑观应将富国分为财富积累（“理财”）与求取财富积累的能力（“格致”）两个不同的层次，这与李斯特区分开财富与财富的原因（生产力）亦十分接近。饶有意味的是，李斯特与郑观应不约而同地借捕鱼来发挥思想，这似乎暗示着两人有共同的关注。

如何发展生产力包含着对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一系列因素的分析。李斯特认为影响一国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因素是

多种多样的。他把这些因素划分为四大类：物质资本、精神资本（或智力资本）、自然资源和社会政治环境。这其中李斯特尤其强调“精神资本”的重要性。他说：“生产力主要在于个人的智力和社会的条件，我称之为智力资本。”“一个国家通过改进社会和智力条件，就能够运用现有的物质资本，使生产力提高10倍”^{[3]224}。在李斯特看来，生产力不仅是物质财富积累的结果，而且也是人类精神财富积累的结果。精神资本的增进是生产力增长的不竭源泉，它能提高现有物质资源的利用程度，并使开发和利用新的自然资源成为可能，因此能促进物质财富的成倍增长。在精神资本中，李斯特特别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在李斯特看来，智力资本的提升主要在于教育，而且“一国的最大部分消耗，是应该用于后一代的教育，应该用于国家未来生产力的促进和培养的”^{[3]123}。

晚清探求富强之路是一个渐次深入的过程，时人逐步意识到富强背后有更为重要的心智基础。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商战下》中，曾开创性地提出“心战”说：

心战者何？西人壹志通商，……于是士有格致之学，工有制造之学，农有种植之学，商有商务之学，无事不学，无人不学。我国欲安内攘外，亟宜练兵将，制炮船，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讲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如广设学堂，各专一艺，精益求精，……自能人才辈出，日臻富强矣^{[5]595-596}。

郑观应在《商战》篇阐扬“心战”说明他已经敏锐地察觉到商战既是有形之战，更是无形之战——一个国家改进其精神生产条件这一无形基础乃是实现富强的根本，也才能为商战提供更为持久的保证。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将学校篇、西学篇放在首要位置，足以显示他对近代科学与教育的重视。戊戌后期，郑观应的“心战”被进一步发挥为“学战”，并促生了“学战”思潮。时人有谓“今日之世界，竞争剧烈之世界也。……争之为道有三：兵战也，商战也，学战也。而兵战商战其事皆本于学战”^[6]。1897年，在湖南龙南致用学会订立的章程中又进一步提出了“学战”应该要以兴学会为本：“今之人才，动曰泰西以商战，不知实以学战也；商苟无学何以能战？学苟无会，何以教商？故今日之中国，以开学会为第一要旨”^[7]。一时间，全国掀起兴办学会的热潮。

郑观应在“商战”论中强调“心战”的作用，表明他在分析中国经济社会问题时意识到国民素质的重要性，这与李斯特的精神资本论不谋而合。

由心战转换为学战，由学战促进学会兴起，由学会又进一步推动教育制度变革，郑氏心战说的影响不可低估。

三、工业进步与振兴实业

李斯特强调精神资本的重要性是围绕着生产力这一概念展开的，其现实的目标就是要完成一项划时代的转变，即建立国家的工业化体系。李斯特剖析道：“国家生产力的增长，其中更重要的是工业力量的增长”^{[3]202}，“科学与工业结合以后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这种力量在新的社会状态下代替了古代奴隶劳动，它对于大众的生活状态，对于人口向无人迹地区的移植以及对于原始文化国家的力量，无可避免地发生着莫大影响——这就是机械力量”^{[3]174}。

由此，“工业进步”成为李斯特国民经济学的又一核心范畴。李斯特非常重视“工业进步”对人和发展的意义。他说：“一切现代国家的伟大政治家，几乎没有一个例外，都认识到工业对国家财富、文化和力量的重大意义”^{[3]131}。据此，李斯特揭示了大工业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整体性：一切的工业部门彼此之间有着极密切的交互作用：“一个部门有了改进时，就为其他一切部门的改进做好了准备，起了推进作用；忽视了任何一个部门时，其他一切部门必然要感受到由此发生的影响”^{[3]323}。在此基础上，李斯特还进一步论述了工业推动社会转型的重大意义，他认为工业的进步必将彻底改变农业社会的精神面貌和政治制度。因为，工业的进步为农业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会促进人们抛弃传统观念和习俗，突破地域界限，开阔视野，培养起勤劳、节约、未雨绸缪、竞争、讲求时间效率等新型的民族精神，推动人们去开拓创新，发明新的生产技术，争取自身的发展和自由权利。李斯特曾多次强调，落后的农业社会必然与专制制度和愚昧相联系，而先进的农工业社会和农工商业社会必然与自由和科学相联系，他由此而得出结论：工业进步是落后农业国实现向先进工业国转变的根本动力。在强调“工业进步”的深远意义时，李斯特特别留意到机械工业的重要地位，由于“机械力量”是由机械工业释放出来，所以他指出“机器工业是工业的工业”^{[3]265}。

相较于李斯特的工业化理论，郑观应的“重商思想”中也明显地表现出“重工”倾向。他指出工业在资本主义强国的地位：“夫泰西诸国富强

之基，根于工艺”^{[5]719}。他已经发现“工”乃“商”之本：“诚所谓西人之富在工不在商。盖商者运已成之货，工者运未成之货，粗者使精，贱者使贵，朽废者使有用。有工业然后有货物，有货物然后有商贾耳”^{[5]729}。于是郑观应指出，“欲救中国之贫，莫如大兴工艺”^{[5]728}。而若能“以格致为基，以制造为用”，则“器物日备，制造日精。……而国富民强之左券也！”^{[5]723}。在如何“兴工艺”的问题上，郑氏进一步提出了四点主张：“设工艺专科”、“开工艺学堂”、“派人游学各国”以及“设博览会以励百工”。^{[5]728}除此以外，郑观应还特别强调了机器工业优先发展的重要性，他说道：

论商务之原，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人但知购办机器，可得机器之用；不知能自造机器，则始得机器无穷之妙用也。宜设专厂制造机器，……各种机器自能制造，则各种货物亦自能制造^{[5]626-627}。

可以看出，郑氏所谓“各种机器自能制造，则各种货物亦自能制造”与李斯特所谓“机器工业是工业的工业”相比，确是十分相似的表达。不过，李斯特对工业化之分析要比郑观应深刻很多，李斯特更多地是从社会转型的结构性变革论说明发展工业的重要性：“工业是科学、文学、艺术、启蒙、自由、有益的制度，以及国力和独立之母”^{[4]66}。从这句简短的文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李斯特对工业的评价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相比而言，郑观应对工业的讨论则更多地注意到发展工业的表层功利效果——生产效率的提高和中国之利不至外溢，却没有进一步认识到发展工业对于一个国家实现整体社会转型所具有的潜在推进作用。

不过，郑观应“重工”思想的萌芽特别是他较早提出的“实业”概念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894-1895年间，郑观应在《致金荃仁观察书》中说到：“查工艺一道向为士大夫鄙为末技，谓与国家无足轻重。不知富强之国首在振兴实业、改良制造、多设工艺厂，殫亿兆人之智力，阐造化之灵机，奋志经营，日臻富强，以雄宇宙”^[8]。郑观应明确地提出了“振兴实业”的主张，其内涵因20世纪初“实业”一词的流行而被进一步丰富，初步完成了晚清经济思想由“重商”到“重工”的嬗变，而从“实业振兴”、“实业救国”到后来张謇的“棉铁主义”，重工思想又进一步深化了国人对如何发动工业化这一问题的认知。由此看来，尽管郑观应的重工论尚显粗简，而德国工业的腾飞还是在1846年李斯特去世之后，但二人都开启

了各国工业化思想的先河。

四、政府干预与官、商协同

政府干预论是李斯特整个理论体系的政策落脚点。在李斯特看来，除了德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于英法两国是政府干预的依据外，干预论得以成立的内在根据还体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私人经济本身固有的弊端。李斯特认为私人企业的能力是有限的，其眼界很少跨越出本企业的范围，往往局限于眼前的利益。私人经济同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长远利益有时会不一致，因此放任自流并不是总会提高国家的福利和实力。其次，私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整个国家资本和技术所构成的联合力量”的保护和扶持。其三，个人主要通过国家才能形成生产力。

在政府干预论中，李斯特也意识到其中所可能包含的负面作用。他指出，政府干预并不是把私人经济“统死”。干预的原则是，“它对个人怎样运用他的生产力和资金这一点，并不发号施令；……这是由个人自己决定的事情，它是决不过问的。……关于国民各人知道更清楚、更加擅长的有些事，它并没有越俎代庖；相反地，它所作的是，即使个人有所了解，单靠他自己的力量也是无法进行的那些事”^{[3]265}。可见，这种政府干预“一点也没有束缚私人事业；相反地，它使国内个人的自然的以及金钱上的力量有了更加广阔的活动领域”^{[3]146-147}。在政府和私人经济之间李斯特试图通过构建合理的制度体系以实现优势互补、劣势互祛的均衡：“国家在经济上越是发展，立法和行政方面干预的必不可少，就处处显得越加清楚。只要同社会利益无所抵触，一般来说，个人自由是好事；同样的道理，个人事业只有在与国家福利相一致的这个限度上，才能说行动上可以不受限制，但如果个人的企图或活动不能达到这种境地，……私人事业在这个限度上就当然需要国家整个力量的帮助，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也应当服从法律的约束”^{[3]147}。

在李斯特看来，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要实现对本国幼稚产业的保护。因此，关税政策是国家干预的重要内容。关税保护重点是工业，特别是基础性工业部门。不过，李斯特也清楚地认识到保护政策是特定阶段的非常措施，总体看则应与自由贸易交替使用。当本国幼稚产业一旦“达标”，就应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将成长起来的幼稚产业完全推向市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

起本国工业部门的真正优势。

在近代语境中，国人对政府干预问题的关注往往表现为对官、商关系的讨论——政府是由具体的“官”构成的，官即代表政府、政府行为和经济政策；“商”是市场的主体，商则代表市场、市场行为和自由经营。针对由来已久的官、商矛盾，时人大都站在“商”的立场上猛烈抨击“官”之擅权剥削，因而认为应给予商人以完全自由的经营之权，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五卷本“商务二”一篇中的言论可谓之为其中的代表：“故欲整顿商务，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5]611-612}。饶有意味地是，在紧随其后的“商务三”一篇分析中国商务之病时，郑观应又认为“推原其故，上在官而下在商”，也就是说官、商皆有其弊。在论及商之弊时，郑氏直言不讳：

至于商则愚者多，而智者寡；虚者多，而实者寡；分者多，而合者寡；因者多，而创者寡；欺诈者多，而信义者寡；贪小利者多，而顾全大局者寡。此疆彼界，畛域攸分，厚己薄人，伎求无定，心不协力不足。故合股分而股本亏，集公司而公司倒。此弊在下者也^{[5]615-616}。

在晚清官、商关系中，官僚多站在“官”的立场上批评“商”，但鲜见商人进行自我批判。郑观应在这里已然摆脱曾为买办、商人的身份局限，超然于外，更为理性地看待商人之弊——商人这一群体大多数者视野狭隘、无组织性、无大局观，其职业素质和职业操守亦不敢恭维。在郑氏看来，正是因官、商各有其弊，所以相互猜忌、攻讦，致使中国商务长期不振。比较郑观应在“商务二”和“商务三”的文字，其主张颇有矛盾之处，他一方面认为商务应以“商贾之道行之”，另一方面又历数商人种种之弊。郑观应似乎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在1900年手定八卷本时，对“商务二”一篇“故欲整顿商务”之后的文字几乎进行了重写：

今欲整顿商务，必须仿照西例，速定商律……庶几上下交警，官吏不敢剥削，商伙不敢舞弊。公司所用之人无论大小皆须熟悉利弊，方准采用，当道不得滥荐，举从前积弊一律扫除^{[5]612-613}。

郑观应经过深思熟虑转换了解决问题的路径。由于官、商皆有其弊，所以官的干预和商的自由经营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替代关系，应通过一套具有法律效力的制度安排使官、商两种力量达致“均衡”，这既能维护经济秩序又能保护私人产权和自由经营之权，从而使官、商关系能够在准则指导下走向长久融洽。郑观应显然主张政府和市场都应受到一种制度性约束，但在重商的实践

中，政府“保商”、“护商”的积极干预也是必不可少的，即郑观应所谓“任之以领事，卫之以兵轮”；“设学堂以启牖之”；“多出国帑倡导之”；“轻出口税扶植之”^{[5]607-608}。综观《盛世危言》，郑观应主张政府对经济社会进行广泛地积极干预。而如何干预？这无疑又将牵涉到深层次的社会结构调整，郑氏有谓：“有国者苟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9]。

不难看出，李斯特和郑观应的政府干预思想有很多共通之处。他们都认识到政府干预与经济自由各有利弊，它们并不是一种替代关系——现代化进程中绝不意味着自由放任，而是需要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从而使政府与市场实现最佳的契合并相应地展开制度建设。值得注意的是，在干预论中郑观应同样强调了关税政策对于保护和鼓励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他在《盛世危言·税则》篇中较为全面的阐述了关税保护的基本原则框架：关税自主原则，关税制定为一国内政，各国有权根据国内具体情况对关税政策自行变通；轻税、免税原则，凡本国必需的商品以及本国出口商品均采用之，从而鼓励国内生产的发展；重税、禁止进口原则，凡与本国商品形成竞争的进口商品、奢侈品以及有害商品采用之，以此保护国内市场；关税互惠原则，各国关税应互惠互利，否则应采取抵制政策。

就当时情势而言，关税保护确实为中国所必需，但郑氏没有动态地分析关税保护政策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而在李斯特看来，长期实行这种政策会使本国产业缺乏市场竞争力，因此如果幼稚产业通过关税保护获得了充分发展就应该放弃这一政策使之充分参与市场竞争。

五、“发展经济学”的先驱

郑观应和李斯特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各自国家如何从贫困变富裕、从落后变先进，而这正是“发展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即张培刚先生所指出的发展经济学是“主要研究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问题”^[10]。若从“学”的角度考察，“发展经济学”是20世纪40-50年代形成的，之前则是“史前史”。但就涉及的问题而言，一些“史前史”中的经济思想如郑观应和李斯特的经济思想则也属于发展经济学。虽然李斯特被视为德国经济学说史中历

史学派的先驱，但他也是第一个系统探讨并回答经济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向先进工业强国转变的经济学家^[11]。郑观应虽未曾系统地了解过李斯特的经济思想^①，但他对于中国寻求富强的路径选择却有着比较完整和独到的认识。他们都认识到经济发展的民族性，而各自国家独立地发展民族经济赶超先进亦都需要进行深刻的经济社会转型，需要对国家角色重新定位——这是一个涉及数量扩张并包括制度、组织和文化等非数量因素变化的过程，而经济是在这些非数量因素下运作的。事实上，考察制度、组织和文化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理解经济变量同制度、组织和文化相互作用的过程正是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研究路径。

当然，受限于智识，郑观应尚无法构建严格的发展经济学概念和理论体系。不过，正是“重商”思想中孕育的“重工”观念才引导出张謇的“棉铁主义”，而后者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又进一步理论化为张培刚先生所创建的以农业国工业化为核心的“发展经济学”。由此，几代人的上下求索刻画出中国“发展经济学”的早期演进路径。尽管面临艰难时局，但所抱定的信念始终未变，追求富强的强烈情感内化在理性的思考之中，如郑观应在《商战上》中所言：夫日本商务既事事以中国为前车，处处借西邻为先导。我为其拙，彼形其巧。西人创其难，彼袭其易。弹丸小国，正未可谓应变无人，我何不反经为权，转而相师，用因为革，舍短从长，以我之地大物博、人多财广，驾而上之犹反手耳^{[5]591}。

郑氏这里借日本的例子道出了发展经济学中的“后发优势”理论。先发国家虽有优势，但后起国家若能充分借鉴、吸收先发国家积累的成果和经验就能够少走很多弯路、节省大量成本，这就是他所说的“西人创其难，彼袭其易”。这样，中国可取得与先发国家同样的发展成果，甚至超越它们。总之，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多角度、多层次地探求在经济上摆脱落后、跻于先进的道路，提出了以“重商”、“商战”为核心的赶超发展模式，这成为后来中国发展经济学的重要思想渊源，为具有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开启了方向。

[注 释]

① 1925年，中国学者刘秉麟所撰写的《李士特经济学说与传记》出版，这是我国学者首次以专著的形式介绍李斯特的学说和生平。1927年李斯特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由王开化翻译并出版，定名为《国家经济学》。郑观应卒于1922年，因此可判断郑观应

几无可能全面系统地了解李斯特的经济思想。

[参 考 文 献]

- [1] 杨祖兰.户部候补主事杨祖兰折[M]//佚名.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420.
- [2] 赵靖,石世奇.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续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14.
- [3]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4]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5] 郑观应.盛世危言[M]//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 [6] 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M].北京:三联书店,1963:394.
- [7] 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第4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465.
- [8] 夏东元.郑观应集(下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523.
- [9]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M].台北:大通书局,1969:序言.
- [10] 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2.
- [11] 叶险明.论李斯特关于经济相对落后国家向先进工业强国转变的思想[J].经济科学,1998(2):122.

Forerunner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On Economic Thoughts Comparison of Zheng Guanying and Friedrich List

XIANWE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 710062,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rgues that both Zheng Guanying, the representative of mercantile thought in the Late-Qing dynasty, and Friedrich Lis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sts in the 19th century in Germany devoted to exploring the economic developing mode of their country in the similar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Through the comparison,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multi-dimensional feature of their economic thoughts present similar developing way to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Their thoughts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economics under the challenge of the outside world, while Zheng Guanying set the direction and paved the way for the emerging development economics later in China.

Key words: Zheng Guanying; Friedrich List; Comparison; Economic thought; Development economics